

欧洲协调机制的历史与理论分析

郑先武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关键词] 欧洲协调; 大国协调; 会议外交; 安全机制

[摘要] 欧洲协调是19世纪英、俄、法、奥、普(德)等大国共同管理欧洲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来决策,并按照协商一致、合法性、吸收与融合、责任与干预、自我克制等一系列共同的规则与规范来实施。它通过阻止单边行动、平息国际和国内战争与危机、批准或保证新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等具体行动,在维持与促进欧洲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协调已成为当代大国协调的“原型”。

[中图分类号] D8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0)01-0078-07

由英国、俄国、奥地利、法国、普鲁士(后来的德国)“五大国”主导的、贯穿19世纪的欧洲协调,被誉为“外交技巧的一种重大创新”。^{[1](P27)}从汉斯·摩根索开始,欧洲协调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协调已成为蓬勃发展的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制度研究核心议题。尽管关于欧洲协调理论观点一直存在明显分歧,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承认,欧洲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安全机制在维持19世纪欧洲持续的和平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用摩根索的话说,欧洲协调存在的几十年间,“在维护普遍和平问题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2](P494)}更重要的是,欧洲协调作为安全合作的一种创造性模式,已成为当代大国协调的重要基础,并构成欧洲区域安全合作和全球性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如两战期间的国际联盟和现在的联合国)的基本支柱。近年来,随着大国和大国集团在严峻的全球和区域安全问题解决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日益突显,大国协调机制的经验性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如

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都成为构建大国协调机制的新实践。鉴于此,本文从国际视角将历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探讨欧洲协调制度所涉及的几个核心问题,主要包括其核心行为体、决策程序、活动领域、规则与规范等,并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其实际效果做出了评估,以期有助于人们对欧洲协调及其对构建当代大国协调机制的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一、欧洲协调的主体、程序与领域

总体上看,贯穿于1814—1914年整整100年间的欧洲协调涉及5个核心问题,即谁来协调?如何协调?协调什么?靠什么协调?协调的效果如何?它们分别涉及欧洲协调的核心行为体、决策程序、活动领域、适用的规则与规范及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些问题既涵盖了欧洲协调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也最能体现欧洲协调的核心特征,

[收稿日期] 2009-12-07

[作者简介] 郑先武,南京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安全与区域合作理论和实证研究。

因而是理解欧洲协调机制的关键所在。

欧洲协调初始于1814年9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会议前夕,俄、英、奥、普四大国的大臣们先期抵达维也纳,并一致同意英、俄、奥、普、法等“大国”拥有维也纳会议决策权。大国决策的原则就此确立并成为维也纳会议的基础。虽然维也纳会议由来自欧洲的15个王朝参加,但真正的事务是由“五大国”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来完成的,所以,“五国会议”才是“真正的维也纳会议”。^{[3](P81-94)}

那么,欧洲协调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策呢?那就是召开“五大国”所主导的欧洲会议。也就是说,欧洲协调是通过大国之间的会议来展开的,所以,又被称为会议外交。这种外交最终被国际条约固定下来。1815年11月,英、俄、奥、普签署的《四国联盟条约》第六条特别规定,为促进和保证本条约的履行,亦为加强四国君主间团结无间以谋求举世康乐之相互联系,缔约国同意定期举行会议,以便磋商其共同利益,并考虑各个特定时期可被认为最有益的措施,以利于各国的安宁、繁荣以及欧洲和平的维护。^{[4](P19-20)}以大国会议为核心的欧洲协调就此走向机制化。

具体而言,大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会议主要有3种形式,即重大战争结束后的欧洲和平大会、平时讨论总体或具体问题的欧洲大会(Congress)以及解决具体的国际危机的一般会议(conference)。前两种欧洲大会的形式基本相同,都是欧洲各国国王或政府首脑、外交大臣参加的,是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欧洲高峰会议。不同的只是前者主要是缔结或确认战后和平解决办法,如1814—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巴黎和会等;后者主要是落实和强化和平大会的成果,或者结合国际时局对已有和平解决办法进行修正,偶尔也有对一些具体的危机事件做出具体的安排,如1818年的亚琛会议、1878年的柏林会议等。最后一种会议主要是寻求和平解决一些具体的国际危机,是一种低规格的小规模会议,一般是外交大臣、外交特使、驻外大使等高级外交官参加,如1840年1—7月两次关于近东危机的伦敦会议、1831年关于比利时问题的伦敦会议等。这些会议虽没有任何正式的国际机构

所支撑,但各大国借此商谈、争辩和讨价还价所产生的结果常常具有实际权威和合法性。最重要的是,会议产生的各种国际条约成为“欧洲法律”,被认为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

在回答了欧洲协调谁来协调、如何协调这两个问题后,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即欧洲协调的活动领域。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清楚欧洲协调的核心功能,那就是维持欧洲持久的和平。这一点在欧洲协调相关的核心外交文件中都有规定。在和平时期召开的首次欧洲大会——亚琛会议上,“五大国”发表“共同声明”再次申明,欧洲协调的目标也是其义务就是为欧洲提供未来的安宁。声明说,大国间这一紧密的联合“除了维护和平并保证和平赖以缔造和巩固的各项事务外别无他求”,即“这个世界的安宁将是恒定的动机和最终目标”。^{[5](P84)}在当时的形势下,保持欧洲和平有两个核心侧面,即抑制国家间(主要是大国间)的冲突和战争、解决各国内部的动乱和变革问题(主要是国内社会革命和民族独立)的地区扩散。这就是欧洲协调的核心活动领域。用霍尔斯蒂的话说:“革命与战争这对孪生幽灵驱使调停者为欧洲维持一个治理体系”。^{[6](P40)}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拿破仑战争的惨痛教训,即革命常常引发国家间战争,应对各国国内的自由或民族革命成了欧洲协调最重要的活动领域。1815年12月,卡斯尔雷注意到各种条约的直接目的是“用盟国曾经克服过的威胁来刺激欧洲各国,使他们觉得现实的一致是对付革命死灰复燃的唯一最佳安全手段。这种革命的灰烬在每个国家都多多少少存在。他们明智的选择是放下平时的琐碎争执,团结起来支持既存社会秩序与规则。”^{[7](P103)}所以,就活动领域而言,欧洲协调的核心指向既有军事安全,也有非军事的政治安全。可以说,对来自非军事威胁的政治安全的核心关注,是作为安全管理制度的欧洲协调的一个主要创新之处。

鉴于欧洲协调的上述核心特征,它被定义为“大国在国际危机发生时一起开会来保持和平,并促成解决欧洲问题的欧洲方法”。^{[8](P162)}摩根索说:“各大国利用会议外交协调对策,对付政治体

系受到的任何威胁,这便是欧洲协调。”^{[2](P253)}

二、欧洲协调的规则与规范

在具体运行的过程中,欧洲协调的会议外交是按照一系列的规则与规范行事的。这些规则与规范有正式的,主要经由一些国际条约确定下来的明示的规则,也有非正式的,主要是各大国外交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的行为规范,大多是未经阐明的会议、商谈和非正式交往之基础性规范与假设。这些规则与规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协商一致。在涉及安全的重大问题上,通过协商寻求共识是会议外交的核心特征。这也是一项辅助性的决策原则。在这项原则的指导下,大国在面临国际危机时应寻求协商解决,而非单边行动。欧洲协调时期达成的许多国际条约尤其是涉及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时,均包含大国放弃寻求单边优势的条款。这种协商一致虽然时常有法律意义上国际条约的最后签署,但它并不采用投票表决,而是采用达成共识的决策方式。这就意味着“协商一致”并非“完全一致”,而是“没有反对的一致”。在这里,只要大国不明确反对,或退出或漠不关心,就是同意。也就是说,这种“共识性同意”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认的。这种协商一致有一个更高的“大国共识”所支撑,那就是“五大国”一再申明的“彼此亲密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并共同维护和平”。^{[4](P22)}在欧洲协调机制内,这种“团结一致”的最高体现就是当时的外交文件、信函频繁提到的一个政治统一的“欧洲”。这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所说的“欧洲大家庭”、英国首相卡斯尔雷描述的“欧洲政府”、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所提及的“欧洲之家”。1831年2月,“五大国”伦敦会议19号议定书中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权利;但欧洲也有它自己的权利;正是社会秩序赋予它这种权利。”^{[5](P91)}

(2) 合法性。任何国际体系要想持久,都必须满足对合法性的特定的需要,欧洲协调作为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工具,当然也不例外。按照通常的解释,“合法性”意指使政府权威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和对其国民统治合法化的、公认的标准和

秩序。^{[9](P803)}在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外交大臣塔朗朗首先将合法性原则当作和平解决办法的指导原则,并获其他大国的支持。按照这种原则,除非经过合法的程序,欧洲现有王朝及其领土均不得随便处置。这种安排主要是1814年5月和1815年11月英、俄、奥、普等国与法国签订的两次《巴黎和约》和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与会各国代表签署的《最后议定书》,统称“维也纳解决办法”。该办法构成拿破仑战争后几十年间欧洲协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在欧洲协调框架内,合法性强调的是国际法认定的事实,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国际局势的变化适时做出修正,只要这种修正得到所有大国和当事国的同意并不危及已有的国际体系的稳定。比如,1831年允许比利时的独立就是对“维也纳解决办法”的首次重大修正。按照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规定,比利时让予荷兰,由奥兰治王朝成立荷兰联合王国。比利时问题的成功管理无疑是欧洲协调的一次重大成功。

(2) 吸收与融合。欧洲协调强调团结一致,但并不能消除各国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只是通过一种集体管理机制来限制它。这种限制并非采用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实力政治,而是主要通过吸收与融入的办法将潜在的竞争对手“锁入”合作性的制度框架内。卡斯尔雷将这种控制性政策称作将有进攻性能力的国家“组成集团”。梅特涅称之为“道德联系点”。^{[8](P168)}在具体行动中,这种吸收与融合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欧洲协调不能将某一大国排除在外,即便是昔日的或潜在的敌人,除非它自愿放弃这种权利。典型的例子是欧洲协调最初启动时允许法国加入和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协调恢复时允许俄国再次加入。二是欧洲协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求同存异”中谋求政治上富有异质性的国家间的“共存”。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在政治上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即大陆国家保守的王朝统治和英国自由的宪政统治。法国七月王朝建立后这种情况明显深化。但欧洲大国承认国际体系的这种异质性,因而这种政治“裂缝”并不妨碍它们对欧洲和平的共同追求。这显示了欧洲协调的灵活

性,也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

(4) 责任与干预。由于欧洲协调机制没有强制性的共同机构作为共同行动的支撑,其和平目标的实现就特别依赖于成员国的责任,尤其是大国的责任。可以说,可靠的共同责任是欧洲协调有效运行的强有力支柱。对所有成员国而言,这种可靠的责任首先是对相关国际条约的尊重与履行。它要求欧洲各国将那些它们同意的,尤其是它们彼此间达成的国际条约视作一种有约束力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没有所有缔约国的同意,所有条约都不能修改。当然,“五大国”是这种共同责任的核心承担者。在该机制中,“五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条约义务”上升到共同利益的高度,并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原则”。^{[10](P11-13)}正是这种“共同责任”使大国军事干预合法化。但这种干预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干预,即它是“危机国际化”和条约、外交等非武力手段无效后的“最后一搏”。欧洲协调成功的事例大多存在这种合法化的大国干预。如1830年2月,英、法、俄三国签订《伦敦议定书》正式宣布希腊脱离土耳其独立前,三国均出兵对希腊独立革命予以军事上的支持;1838年3月,荷兰接受“五大国”和平条款正式承认比利时独立之前,英、法出兵对比利时予以军事支持。^{[11](P96-114)}难怪,有学者称,当时欧洲国际秩序的建立与维护的“最后依赖于允许使用武力”。^{[10](P10)}

(5) 自我克制。在欧洲协调机制中,最后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共同行为规范就是各大国的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既表现在它们奉行温和的对外政策,又表现在在解决重大的利益纷争中将和平手段奉为上策。在亚琛会议上,“五大国”明确表示,在大国国际会议上,无论是讨论彼此有关的共同利益的问题,或者涉及他国内政的问题,它们都应该“树立一个正义、和谐与节制的榜样”。^{[4](P24)}各大国推行自我克制的外交,对待昔日的敌人和现实的手对手的态度会温和起来,对外扩张的野心会收敛起来,它们就更愿意通过相互协商与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正是这种温和的克制才使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和克里米亚战争

后俄国得以很快融入欧洲协调机制之中。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俄在整个欧洲,奥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普在德意志地区都有寻求霸权的优势,但它们都没有这么做。法国虽然战败了,但没有报复的要求,更没有企图夺回原有的优势。英、俄两国外交的温和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英国的财政和军事实力、俄国的军事实力是决定欧洲外交的决定性因素。实际情况却是,这两个欧洲“侧翼大国”成为欧洲协调最初建立和有效运行的核心大国。所以,理查德·朗豪尔称,欧洲协调诸多引人瞩目的成功的根基是,“五大国”共同接受并实施“有节制的利益目标中的克制外交”。^{[12](P4-5)}

上述五种独特的规则与规范是欧洲协调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依据,它们与大国主导的会议外交一起成为欧洲协调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实质上,欧洲协调已经通过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安排超越了旧的欧洲均势政治的逻辑,成为国际安全制度的一种重大创新。

三、欧洲协调的实际效果与背景条件

欧洲协调时断时续运行的100年间主要处理了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国内危机以及“维也纳解决办法”所建立起的国际秩序做出变动的问题。协调成功的例子主要表现在:一是阻止单边行动。如1841年7月的《伦敦海峡公约》将土耳其海峡置于国际共管之下,限制或剥夺了任何大国单独控制土耳其海峡,进而控制土耳其帝国的可能性,并迫使俄国放弃了1833年7月与土耳其签署的《温卡尔—伊斯凯莱条约》所获取的优势;1878年的柏林会议对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圣斯蒂法诺条约》做出修改,限制了俄国的单边所得,使其条款与各大国利益相符等。二是平息国际战争或危机。如1839年5月至1840年7月签署《伦敦协定》,平息了第二次土埃战争;1850年9月至11月,促使普、奥签订《奥尔慕茨协定》,维持了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邦联,化解了两国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冲突;1912年2月至1913年5月,协调并主持签订《伦敦和约》,结束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等。三是处理国内战争或危机,批准或保证新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如承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承认比利时、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的独立等。四是创立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如界定大国军事干预合法化的条件、设立中立区或非军事区等“缓冲地带”,以及国家间发生危机事件时应视环境允许请友好国家出面调停的各种约定等。^{[4][6](P47)}这也是欧洲协调实际效果的最真实反映。

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协调的实际效果明显受制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从国际上看,当时国际关系本质上表现为强有力的无政府结构,即主权国家之上没有更高权威,各国依然把自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追求,并时常通过自助或竞争性联盟来实现。国际体系这种无政府状态本质使得欧洲协调只能减缓国家间安全困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它。^{[13](P167-214)}就此,欧洲协调的运行有两个重要的背景条件,即战争或重大国际危机发生与合理的国际安排的达成以及总体的安全联盟的出现与排他性军事联盟的消失。欧洲协调与战争或危机是紧密相连的。欧洲协调旨在消除战争或危机,而战争与危机的平息又催生了欧洲协调。就欧洲协调的历史来看,正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启动和确立了欧洲协调;而克里米亚战争在欧洲协调失败后发生,欧洲协调又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巴黎和会中重新启动;整个19世纪60年代,欧洲协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统一战争中碌碌无为,但这些战争结束后不久欧洲协调再次恢复,并在再现的近东危机中再次活跃起来。

欧洲协调为何总是产生于大战或重大危机之后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战往往会深刻影响已有的国际体系格局。这种影响可能是因挑起战端的某个大国(通常是寻求霸权的国家)的失败使国际格局回归到战前状态,也可能是因类似大国在胜利中攫取了新的支配性优势,使国际体系格局出现新的态势,而这两种结果都将通过胜利者所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固定下来。就此,潜在的霸权国或在失败中得到强有力的抑制,或在胜利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它们或被动或主动,都成了满足于已有现状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维持现状”既

是欧洲协调的基点,也是欧洲协调的落点。也就是说,欧洲协调的本质是“维持现状”,尽管它时常在一些局部的领土调整中发挥作用,但很难应对国际体系的重大变革。另一方面是因为大战胜利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普遍的安全联盟。基于战争期间反对霸权的联盟,欧洲大国之间的敌意与竞争尽管不可能完全消失,但盟国之间更倾向于产生紧密联系的纽带,从而为战后缔造新的总体性安全联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安全联盟常常脱胎于战争期间共同对付现实敌人的排他性军事联盟,但与之又有很大的不同。根本性的差别在于:在成员上,它有更广泛的代表性,除非对方放弃,它常常吸纳该地区所有重要的国家;在目标上,它追求的是欧洲普遍的和平与稳定,并不以欧洲内部哪个具体的国家为明确的假想敌,所以,它是一种针对来自内部和外部欧洲所面临的共同威胁的维持和平的机制。欧洲协调的“黄金时期”就存在这样的安全联盟,即维也纳会议后相继成立的神圣同盟和五国联盟。两者与欧洲协调的核心成员大体相同、奉行的规则和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所以,这种总体的联盟作为安全管理制度,而不是能力汇聚的机构,更可能被用作“管理的工具”,而不是“权力的机器”,因而它们与欧洲协调是“一种对接的体系”。^{[14](P72-75)}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安全联盟与欧洲协调一样以“保持现状”为基点,所以,它们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排他性或敌对性联盟的产生与作用空间。历史事实表明,1815—1848年神圣同盟存在的30多年间,“五大国”之间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排他性军事联盟。此后,此种性质的军事联盟开始出现,并呈不断蔓延之势。这些联盟助长了欧洲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敌对,乃至酿成局部或全面的欧洲战争并在其中发挥“权力的机器”作用。

不过,大战及其后的国际安排也好,普遍的安全联盟的存在与排他性军事联盟缺乏也好,这些国际体系因素虽然制约着主权国家自身的行为,但其归根结底还是主权国家自己创造的,就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国家自身偏好与政策选择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欧洲国家层次的重大变化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欧洲协调的成败与存废。欧洲的历史表明,引发革命的主导性因素并不是国际问题,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内因素。克里米亚战争后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陆各国掀起一场从未有过的自主性民族主义运动。法、英、俄等实力最强的欧洲大国对这些民族主义普遍持同情乃至公开的支持态度。最终的结果是,普鲁士和撒丁这两个王朝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分别推动了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最后统一,而奥、土这两个传统帝国成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随后,巴尔干地区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等众多的民族一个个建立起独立国家,奥、土却日渐衰微乃至分崩离析。这些民族国家建立和传统帝国崩溃的浪潮,已经深深侵蚀了维也纳会议以来所创建的欧洲国家体系的根基。面对这种根本性变革,以“维持现状”为主旨的欧洲协调已经鞭长莫及。

总之,欧洲协调是特定国际、国内背景条件下运行的一种特定的安全机制。一旦这种背景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与欧洲协调的主旨背道而驰,它就会成为“镜中之花”。这时,欧洲协调要么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要么根本就无从发挥作用,尽管很多时候它依然看上去很美。

四、结 语

欧洲协调既是一种安全机制,也是一种国家间体系,它本质上是那个时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国家行为体所创造的。作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化合作的最早尝试,欧洲协调是真实的,又是脆弱的。它是真实的,因为大国通过会议外交程序和一系列规则与规范的自觉性遵守,显示出“在没有复杂的国际组织存在的条件下,规则能够起到作用。”^[15](P60-66)它是脆弱的,因为弱制度安排和“维持现状”的本质使其难以应对大国间激烈的争斗与冲突以及国际、国内重大政治经济变革。所以,欧洲协调对当代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体上看,欧洲协调中的“大国共治”与协商

一致的决策及其所依据的基本规则、规范对当代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依然大有用处,影响欧洲协调存废的那些背景条件大多仍不会过时。不过,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也有所不同,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不可能是欧洲协调的完全复制,而是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前新的国际背景所进行的再造。关键之处在于,对具体的活动领域和行动方案的实施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在活动领域上,鉴于全球化背景下安全议题日益综合化的现实,当代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必须在关注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议题的同时,适时引入经济、环境等新的安全议题。在行动方案的实施上,鉴于当代大国协调机制已非欧洲协调那样的封闭体系(没有其他国际组织等多边制度、成员和活动领域均限于欧洲),尤其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众多成员国数量和对主权平等的更高要求,在其构建中必须放弃欧洲协调中大国对国际安全事务的集体垄断,尤其是对弱小国家命运的独断性安排。在当前条件下,适当的做法是,大国协调达成的行动方案,可以视具体情况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实施:一是仅仅涉及该机制内大国的行动方案,应该由这些国家在大国协调的框架内自行实施,无需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二是涉及其他国家的行动方案,应交给已有的相关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来实施,前提是这些国际组织愿意这么做。这样,大国协调既能通过拥有可靠的大国责任和合法的国际地位,在解决重大国际危机和紧迫安全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又能有效地维护国际关系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可谓两全其美。

总之,鉴于大国的实力、能力和影响力,从欧洲协调机制中汲取成功的经验,结合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新情况,建构起更加成熟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将是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一条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H. G. Schenk. The Aftermath of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Concert of Europe An Experimen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2]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

- 平(第七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3] Charles Webst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1814—1815[M]. London: Barnes and Noble, 1963
- [4]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M]. 第2卷.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 [5] William H. Daugherty. System Management and the Endurance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A]. in Jack Snyder, Robert Jervis (eds). Coping with Complex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 [6] K. J. 霍尔斯蒂. 没有政府的治理: 十九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多头政治[A]. 载詹姆斯·N·罗西瑙. 没有政府的治理: 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7] K. J. 霍尔斯蒂. 和平与战争: 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8] Richard 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J]. World Politics, Vol. 28, January 1976
- [9]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0] F. R. Bridge, Roger Bullen.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1814—1914[M]. 2nd ed.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5
- [11] 玛莎·芬尼莫尔. 干涉的目的: 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9
- [12] Richard Langhorne. The Collapse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890—1914[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 [13]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J]. World Politics, Vol. 32, No. 2, January 1978
- [14] Louise Richardson. The Concert of Europe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in the Nineteen Century[A]. in Helga Haftendorn, Robert O. Keohane et al. (eds). Imperfect Union: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5] Patrick M. Morgan. Multilateralism and Security: Prospects in Europe[A]. in John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Regime

ZHENG Xia-w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Key words] concert of Europe; concert of great powers; conference diplomacy; security regime

[Abstract] The concert of Europe is a security regime established in the 19th century to manage jointly disputes and crises in Europe by great powers like Great Britain, Russia, France, Austria and Prussia (Germany). Conference diplomacy was its major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 It operated on some shared rules and norms such as consensus, legitimacy,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intervention, and self-restraint.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peace in Europe by means of checking unilateral action, ironing out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and crises, and approving and ensuring the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of new states. It is considered as the prototype of contemporary concert of great powers.

[责任编辑 刘蔚然]